

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

孙华

苏荣誉 著

神秘的王国

三星堆文明丛书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丛刊之

巴蜀书社

孙华  
苏荣誉 著

# 神秘的王国

——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王国/孙华、苏荣誉著. - 成都:巴蜀书社,2003.1  
(三星堆文明丛书)

ISBN 7-80659-401-9

I. 神... II. ①孙... ②苏... III. 巴蜀文化-出土文物-广  
汉市 IV. K872.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4593 号

策 划:段志洪 封面设计:文小牛  
组 稿:段志洪 何 锐 印制监督:郭明藻  
责任编辑:段志洪 李 嘉

本书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即为盗版。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86636481 86241146

## 神秘的王国

孙 华 苏荣誉著

---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58275 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郫县科技书刊印刷厂印刷

郫县东街三段(028)87864170 邮编 611730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20 千

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80659-401-9/K·46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 目 录

序 论	( 1 )
第一章 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	( 17 )
一 孕育出高度文明的土壤	( 19 )
二 三星堆文化形成和发展	( 37 )
三 特征鲜明的三星堆文化	( 54 )
四 来源于中原的青铜技术	( 68 )
第二章 三星堆王国的兴衰	( 112 )
一 三星堆王国建立的基础	( 114 )
二 来自二里头文化的王族	( 129 )
三 三星堆王国对外的扩张	( 155 )
四 走向分裂的三星堆王国	( 170 )

<b>第三章 三星堆王国的政治与礼仪</b> ·····	(193)
一 差别明显的等级划分·····	(195)
二 两合族群执政的复杂社会·····	(214)
三 庄严而凝重的青铜祭器·····	(235)
四 象征权力神授的玉礼器·····	(250)
<b>第四章 三星堆王国的精神世界</b> ·····	(279)
一 崇拜太阳的古代王国·····	(280)
二 人首鸟身的天神与祖先·····	(305)
三 联系天上与人间的使者·····	(317)
四 神庙的焚毁与都城的迁徙·····	(331)
<b>第五章 文化与传说的奇妙联系</b> ·····	(364)
一 三星堆文化为蜀人遗存·····	(366)
二 三星堆古城为柏灌故都说·····	(375)
三 蜀国历史的考古学观察·····	(383)
<b>附录 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初步考察</b> ·····	(399)
一 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考察·····	(402)
二 非商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	(416)
三 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	(426)
<b>后记 关于编写三星堆文明丛书的缘起和设想</b> ·····	(444)

## 序 论

四川盆地位于祖国的西南，在秦王朝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以前，这里曾经存在着两个古老的王国——巴国和蜀国，四川盆地的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鲜明地方特色，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四川盆地先秦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具有强烈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持久性，它在传统的模式中属于连续不断、不断发展的精进传统。正由于四川盆地传统的高度稳定，使得秦灭巴蜀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文化仍然以其确定的方向和惯性继续保持。稳定和不断断的文化背景，使得四川盆地古代的一些历史信息能够被保存和记录了下来。传为西汉学者扬雄撰写的《蜀王本纪》，是中国中原地区和吴越地区以外仅存的记录下了当地先秦古王族世系片断的古籍<sup>[1]</sup>，中国最早的地方志书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出现在四川盆地而不是其他地区，也与四川盆地根深蒂固的不曾间断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川盆地是由西部的成都平原、中部的盆中丘陵和东部的平行谷地三大自然地理单元组成。成都平原地势平坦，河流密布，土地肥沃，自古就是四川盆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以成都平原为统治中心的古蜀国在四川盆地的古国、古族中也始终处在中心的位置，历史文献记载的战国时期蜀国越巴攻楚的事件<sup>[2]</sup>，以及“昔蜀王栾君王巴蜀”的说法<sup>[3]</sup>，就反映了蜀强巴弱的这种历史背景。考古材料反映的具有大型中心都邑的古城址，如广汉三星堆古城、成都古城等，无论其城址规模还是文化内涵，都是四川盆地其他任何地方所不能比拟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巴、蜀历史和传说，古蜀国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灭亡以前，先后经历蚕丛、柏灌、鱼凫、蒲卑、开明五个王朝<sup>[4]</sup>；而根据考古材料建立的四川先秦文化谱系，它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从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村文化开始，先后有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青羊宫文化（巴蜀文化），最后逐渐融会入秦汉文化之中<sup>[5]</sup>。在四川盆地先秦文化这个系统中，分布范围最广阔、文化特质最鲜明、在同时期文化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正是从该文化开始，四川盆地的早期文明开始与中原文明发生联系，开始出现了最早的青铜冶铸工艺而跨入了青铜时代，开始出现了惟一的中心都邑并形成了区域中心的小王朝，开始将陕西南部地区纳入了四川盆地传统文化区。也正是从三星堆文化时期开始，四川古代文化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许多后世长期流传的文化因素都来源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同时也是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为辉煌的文化，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商代长江流

域的青铜文明，不仅翻开了四川古代文明史新的一页，而且谱写了中国古代文明史新的篇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三星堆文化才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才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的一个热点。因此，研究三星堆文化和理解三星堆文明，这既是理解和解释四川古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一环，同时对于理解夏、商时期中原文明与周边文明，夏、商王朝与其他地区的王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星堆文化是以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这种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提出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后期，但这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发掘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四川最早进行的科学的考古工作，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早期重要发现之一。下面就让时光倒流，回到1929年至1931年间的四川广汉县中兴乡，沿着那时候考古学家的足迹，去追寻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三星堆文化的确认和三星堆文明的认识过程吧！

1929年春的一天，广汉县城西北约8公里的太平场（今广汉市南兴乡）农民燕道诚和他的儿子们，在马牧河北岸月亮湾旁自己的田地中挖蓄水塘时，偶然从沟底挖出一些玉石器，燕氏当即将这些玉石器掩盖起来，待到夜深人静后，才与自己的家人将这些玉石器全部挖掘出来。玉石器种类有圭、璋、琮、璧、镯、斧等，数量达400余件。燕氏父子将这些玉石器搬回家中，秘密埋藏起来，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为外人所知晓。燕氏后来将这些玉石器有的卖给古董商，有的送给亲戚朋友，于是燕家挖出玉器的消息就在当地逐渐流传开来。1931



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 H. Donithorne）听到这个消息，对这些玉石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除了找到当地驻军帮助宣传保护和调查外，还将搜集到的玉石器送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牧师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 Graham）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的收获是丰富的，根据这些资料，葛维汉提出了“广汉文化”的命名，并将该文化的年代上限推定在铜石并用时代，下限推定在周代初年即公元前1100年前后。葛维汉还认为，广汉文化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明显的文化传播上的联系，“广汉的非汉族人民受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早期文化影响颇深”<sup>[6]</sup>。1942年，与葛维汉一起在三星堆遗址从事发掘工作的中国学者林名钧也撰文追述了那次发掘工作的情况，他认为月亮湾遗址的发掘遗存分为两个时期，地层堆积的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燕氏所掘玉石器坑（葛维汉与林名钧都称之为“墓”）的时代则较晚，“当为周代之物，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所称，多所吻合”。<sup>[7]</sup>两年以后，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在他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中也用专章介绍了所谓“广汉文化”的发掘经过和主要收获，在将广汉文化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做了比较之后，他也认为该文化有早、晚两种遗存，早期的是地层堆积中的以粗灰陶为代表的遗存，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至历史时代初期之遗物”，晚期的是在挖穿地层堆积的玉石器坑，“年代应当为商周前后”<sup>[8]</sup>。这

些推论，在当时的认识背景下，尽管缺乏论证和必要的证据，但他们关于三星堆遗址年代大致范围的认识（尤其是葛维汉先生将年代下限推定在西周初年以前），以及该遗存与中原文化存在联系的观点，却基本上是正确的。

三星堆遗址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先秦遗址，三星堆文明的探索从这样一个重要的遗址发端，这与中原商文明从安阳殷墟发端一样，使得三星堆文明的探索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信息量丰富的较高基础上。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就长期停顿了下来，不像安阳殷墟那样，发掘工作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这使得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明的认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处在一种停滞不前和发展缓慢的状态，认识的广度和深度都远不如安阳殷墟和商文明。

从1956年开始，考古工作者才又恢复了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首先进行的考古调查实际上是一种地下文物的普查，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有如此大的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称之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sup>[9]</sup>。稍后四川大学历史系又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对遗址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专题调查，进一步查明了遗址中心区的大致范围是上至东胜寺、下至回龙寺以南，长约3000米，还包括马牧河右岸的三星堆及其附近地区<sup>[10]</sup>。这些工作扩大了对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的认识，并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在冯汉骥教授带领下再次发掘了三星堆

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这次发掘把过去当作一层的文化层按土质、土色划分为两层，清理了几座房址和墓葬，复原和成形了一批陶器，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已经展现。据说，当时的冯汉骥教授曾经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sup>[11]</sup>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次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材料当时只有一个极其简单的报道，发掘报告直到1993年才发表，使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延缓了三十年<sup>[12]</sup>。

三星堆遗址真正引起考古工作者重视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1980~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南部的三星堆地点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发掘，为认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奠定了基础。1980~1981年的发掘收获，除了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等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外，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些地层关系结合包含器物的变化，发掘报告首次将三星堆遗址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为第五、第四文化层，第二期为第三、第二文化层，第三期为第一文化层。报告认为，在这三期之中，“第一期和第二期文化遗物的特征变化较大，判然有别，其间又有明显的间隙层，故我们认为第一期与第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去较远，而第二期与第三期遗物的特征差异不甚大，并有不少承袭因素，可能两期文化的年代紧相衔接。”<sup>[13]</sup>发掘报告对于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只是1980~1981年三星堆Ⅲ区遗存的分期，该年区的遗存未见有三星堆遗址偏晚时期的东西，其分期尚不完整。1982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又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

进行了两次发掘，这些发掘的主要收获之一是发现了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该期遗存迭压在1980~1981年度三星堆地点第三期遗存之上，“所出的陶器与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相同。尤其是水观音的细泥尖底杯、尖底罐等典型器在上层大量出现”。这样，三星堆遗址实际上已经划分为四期。这四期基本概括三星堆遗址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为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奠定了基础。从此，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遗存就摆脱了无序而走向有序，人们从此对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发展、转化及其与中原夏、商时期文化关系等问题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或者说有了一个认识的基础）。1986年，考古工作者再次大规模地发掘了三星堆地点，除了清理房屋基址、灰坑等大量遗迹外，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和出土大量遗物，对于三星堆遗址的详细和确切的分期提供了条件。正是主要根据该年度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sup>[14]</sup>。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考古工作者还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除了揭露出大面积的木结构建筑基址外，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正好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相同，这为人们认识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sup>[15]</sup>。

也正是在这一年，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文明走出了考古学家狭小的圈子，成为令世人瞩目和公众关心的对象。1986年三星堆两处盛装着大量青铜、玉石、黄金、骨角等质料的器物的土坑被意外揭露出来，这些器物除了其数量的惊人和制作的精美外，它们中间有许多都是前所未见的新器类

和新器形，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这些复杂多样的三星堆文化的器物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新信息，有力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开展<sup>[16]</sup>。这个发现轰动了国内外，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明从此引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者极大的重视，涌现出了一大批从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三星堆文明的论文，众多新奇的学术观点互相碰撞，使三星堆文明的研究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时期的研究集中在三星堆器物坑和坑内出土的文物上，研究者对器物坑的年代、性质和宗教背景，铜人像或神像的身份、地位和含义，铜器、玉器等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及其来源，这些坑和器物背后的人群及其与东周以后文献记载的蜀人有无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既不乏具有说服力的论断，也有许多没有多少根据的猜测。在形形色色的各种论述和观点中，有些看法的是非曲直，随着《三星堆祭祀坑》正式考古报告的出版，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有的观点和解释现在我们还不能做出准确的评判，它们可能永远不能被证明，三星堆器物坑给人们留下的更多的是一个个谜团。

在有关三星堆器物坑的种种疑问中，年代问题是最为基本的。该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一号器物坑的掩埋时间与二号坑究竟是相同还是不同？二是这两个器物坑究竟相当于中国考古学年表和历史年表的什么年代？该问题的第一方面看似简单，但由于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器物种类和数量差异较大，二号坑又没有出土像一号坑那样的具有时间跨度较短年代特性的陶器，两个坑之间年代的可比较性并不十分理想，在年代距离较

小的情况下，研究者难免会见仁见智。不少学者赞同三星堆器物坑发掘和报告编写者正式报告的结论，认为一、二号坑的掩埋时间不同，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年代跨度<sup>[17]</sup>；也有学者认为一、二号坑的年代应当相同<sup>[18]</sup>，这样就使得两个祭祀坑的埋藏背景的解释变得相对容易。该问题第二方面，研究者的认识分歧尤大，他们主要依靠交叉断代法，根据两个器物坑中所出器物呈现的其他地区已知年代的艺术风格，来推断这两个坑的年代。由于三星堆遗址地处西南，距离用来类比的中原地区或江汉地区较远，不同地区这些貌似相同的器物或纹饰风格是否属于同一时期，它们在传播的过程中有没有时间上的差距，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的不同导致了对这两个坑年代认识的不同。三星堆器物坑的正式报告认为，一号坑的掩埋时间“应在殷墟一期之末与殷墟二期之间”，二号坑的掩埋时间“应当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sup>[19]</sup>；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个坑的年代范围“与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商王朝处在同一个时代（公元前1300~前1050）”，也就是商代后期<sup>[20]</sup>；有的学者认为一、二号坑的年代都在“商末周初”<sup>[21]</sup>，或根据一号坑的陶尖底盏与成都十二桥早期的尖底盏相同，推测“其时代恐怕早不到商代”<sup>[22]</sup>；还有学者将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定得很晚，如李先登主张三星堆器物坑为春秋时期的遗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诺埃尔·巴纳德（Noel Barnard）则以三星堆青铜像设具有战国时期楚文化风格为由，主张其年代应不早于秦灭巴蜀（公元前316年）<sup>[23]</sup>。关于三星堆器物坑年代的这些差异极大的看法，反映了学术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面

上，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远未达成共识。不过，那种将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推定得太晚的结论存在着类比方法的问题，拿三星堆器物坑大量器物中的个别属于某种原始宗教理念的东西当作具有特定时代风格的东西，来与另一具有这种时代风格的作品进行类比以推断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却不参考任何碳素测年数据，不考虑这两个器物坑所包含的器物在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古代文化年代分期序列的位置，不注意四川盆地古代文化与外界联系的变化趋势，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发现，使得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更加重视，他们除了在三星堆遗址内继续开展考古工作外，还对耸立在遗址东、西两面和南面的高大土埂发生了兴趣（当时还没有注意到南面的土埂）。从1988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对尚矗立在三星堆遗址东、西、南三面的高大的土埂进行了多次发掘，确定了这些土埂就是三星堆遗址的城墙，城墙的修筑除了使用了夯筑的方法外，还使用了土坯垒筑的方法，并根据地层关系初步推定三星堆城墙的修筑时期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二期之间<sup>[24]</sup>。三星堆古城的城墙范围和城内大量遗迹的确定，反映出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和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说明了三星堆遗址不是一个普通的邑聚，而是三星堆文明的中心都城。为了弄清三星堆古城周围同时期依次分布状况，1986~1988年，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在广汉、什邡、新都、彭县等县市进行了广泛的专题调查，发现了多个三星堆文化阶段前后的遗址<sup>[25]</sup>，从而使人们的认识从三星堆遗址更扩展到成都平原，使人们认识

到，“这座巨大的中心城址也不是一座孤岛，在三星堆遗址以外的广汉、新都、彭县等地还有数十座同时期的中小遗址。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由中心城邑、一般邑聚和村落组成的复杂社会。处在该文化中心的规模最大的三星堆遗址，很可能就是这个复杂社会的都城。”<sup>[26]</sup>

三星堆文明的探索和研究自三星堆器物坑发现以后，迅速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并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想象的假说。不过，从考古学研究的进展来说，考古学界对于三星堆文明具有较全面和较深刻的认识，还是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在这一段不长的时间里，考古学家们在成都平原、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相继发掘了一系列重要的三星堆文化或与三星堆文化相关的重要遗址，从而为认识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分布、去向、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条件。在成都平原，1997~1998年，考古工作者发现并确认了一系列早于三星堆文化的龙山时代的古城<sup>[27]</sup>，这些古城所属的文化已经以新津宝墩村遗址作为代表被命名为“宝墩村文化”<sup>[28]</sup>，这种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面貌截然不同，但在堆土城墙、房屋建筑等方面却与三星堆文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并且在广汉三星堆和温江鱼凫城这两个遗址的宝墩村文化堆积与三星堆文化堆积之间，还发现了一种宝墩村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过渡文化的堆积，这使探索三星堆文化渊源和形成问题成为可能<sup>[29]</sup>。宝墩村文化的古城规模都相当可观，有的古城内已经发现了大型的宗教建筑，这对于理解和解释拥有巨大中心都邑的三星堆文明产生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的关系，提供了材



料。在峡江地区（即重庆渝东沿江地带和三峡湖北地段），过去只在盆地外缘的三峡湖北地段发现过三星堆文化的遗存<sup>[30]</sup>，整个渝东沿江地带几乎是一片空白。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当时的四川忠县的羊子岩（中坝）遗址首先发现了三星堆文化的遗存<sup>[31]</sup>。1994年，伴随着三峡水利工程的全面上马，为了抢救水库淹没区的地下文物，全国考古工作者云集峡江地区，开始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考古会战，一批三星堆文化的遗址因此被发现和发掘出来。峡江地区新发现并发掘过的三星堆文化遗址有重庆忠县的哨棚嘴（第二期遗存），万州区的中坝子等<sup>[32]</sup>。如果说在这些新发掘的三星堆文化材料公布以前，研究者对这一地区三星堆文化发展脉络的把握主要依靠的是陶器类型学排比的话<sup>[33]</sup>，那么新发现的材料就将这一地区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建立在可靠的地层基础上，为认识盆东峡江地区与盆西平原地区三星堆文化的异同奠定了基础。在陕西南部，1990年，西北大学历史系发掘了汉中盆地的城固县五郎庙和宝山遗址，洋县六陵渡遗址，通过对这几个遗址出土遗物的考察，发掘者初步将其划分为三期，其中第二期“约当中原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二里冈文化时期”，第三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一、二期（或可延续至三期），发掘者认为这些遗存与川西地区的同时期遗存（主要是三星堆文化）关系密切，可以作为“早期巴蜀文化”的一个类型<sup>[34]</sup>。这些陕南汉中盆地的遗存连同先前在陕南安康盆地发掘的紫阳县白马石遗址，使人们对三星堆文化分布区在商代前后期之际前后向陕南地区的扩展或转移有了新的认识<sup>[35]</sup>。随着对三星堆文化遗存